

蔣經國的 一生

從西伯利亞奴工到中華民國總統

漆高儒著



一、家世與求學

地理與家庭環境

通常寫一個偉人的家世，都是免不了提一筆當地的自然環境，這是「地靈人傑」的推理邏輯。例如寫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就免不了要說香山縣這地方，「草經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這本來是熱帶或亞熱帶地方的必有現象，和偉人的出生、成長並非有一定的關聯，倒是國父自述其故鄉有云：「家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礮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每遊賈四方。」

至於經國先生的家鄉，因其父親蔣公，兩代均為國家領袖，於是溪口的風光還有一說的必要。溪口一名錦溪，因奉化的支流剡溪，由此出口而得名，以武嶺為屏蔽，剡水鏡涵，武山枕藉，是奉化風景最優美的所在，屬禽孝鄉的轄境。鎮上市廛連接，阡陌交錯，居民九百餘戶，其中蔣氏為大族，佔

五百戶，或耕或讀，或工或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好像世外桃源一樣。溪口距奉化縣城約十五公里，鎮東越過武嶺，便是郊野。剡溪的水清澈見底，源泉汨汨，一碧如洗。兩岸卉木雜生，怪石嶙峋，和對峙的雪竇、徐覺諸勝，遙相輝映。每當夕陽西下，武嶺倒影，投向溪水，景色壯麗。時屆春令，綠蔭夾岸，麥浪起伏，到了秋天，稻香滿畦，落楓遍地，這一切都顯示著大自然的幽美，和農村生活的可愛。溪口西去雪竇山凡五公里，有公路可達，雪竇山海拔六百公尺，有四明第一山之稱，較之天台山巖壁雄偉，雁蕩山的澗谷奇秀，與天目山的林木蒼潤，實兼而有之。山上有雪竇寺，始建於唐代，有宋太宗所建藏經閣，稱禪宗十剎之一。尚有妙高台、千丈岩、隱潭等勝蹟，妙高台構築奇雅，處境清幽，憑欄遠眺，山色湖光，奔來眼底。千丈岩瀑布，瀉如匹練，終年澎湃吟嘯，有萬馬奔騰之勢，尤稱壯觀。王安石詩：「拔地萬重青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機絲掛，映日還成五色文。」曾鞏詩：「玉虬垂處雪花翻，四季雷聲六月寒，憑檻未窮千里勢，請從岩下舉頭看。」即詠此。隱潭有頭隱潭、二隱潭、三隱潭，為雪竇山三大巨瀑，亦為溪口名勝。現武嶺已闢為公園，以天然景物而加人工修飾，更增山林泉石的逸致。經國先生自幼馳騁其間，受自然環境的感染殊深，因此一般人當然認為「地靈人傑」。實際上說，應該是「人傑地靈」，一個地方出了名人偉人，於是就有人添油添醋的說該地如何如何的鍾靈毓秀，但是夷考名人偉人的成功立業，與其性格有極大的關連，所以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國父的成功，不是由於家鄉風光之美，乃在於他的堅忍不拔的性格，如「孫

文學說」自序云：「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瘁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阻，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又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者，十常八九，總在於刻苦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至於經國先生的成就，既不在於「地靈人傑」，也不在於有其偉大的父親，而在他自己堅忍圖成的性格，概括說就是他自勉的：「冒人家所不敢冒的險，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負人家所不肯負的責，忍人家所不能忍的氣。」

在國內讀中小學

經國先生在六歲時，進入奉化縣武山小學就讀，他在教師周東的指導下在該校讀了兩年。後來他的父親爲他聘請顧清廉先生爲家庭老師而離開該校。三年後，他父親又爲經國先生聘請另一位家庭老師王歐聲，一年後，他進入奉化最優良的龍津小學。

民國十一年三月，經國先生前往上海，進入萬竹小學四年級就讀，他經常從他父親的手諭中獲得教訓，要他勤習書法、中國古文、英文和數學。十三年中，經國先生畢業於萬竹小學，次年春季，他進入浦東中學。在浦東讀書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天堂與地獄」的作文，當時他寫的是：「我不知道天堂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地獄在那裡，不過我自己覺得，沒有偷懶騙人，並且做一些好事，心裡

就覺得舒服，那就好像生活在天堂裡，如果做了對不起別人的事，即使吃得好，穿得好，還是好像生活在地獄裡。」

這是經國先生在少年時代的觀點和感受，以後終其一生還沒有改變。經國先生有一次勉勵青年朋友們：「回憶在自己過去快近六十年的生活中，有過『天堂』的生活，同時也有過更多『地獄』的苦痛生活。青年朋友們：我知道自己的知識程度，一定不如你們，並且相信如果要和你們一起考今天的大學，一定會考不贏你們的。但是我所經歷的事比你們爲多，我所看到過的、聽到過的亦要比你們爲多。根據自己所體驗到的生活教訓，我想再告訴你們一段話，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是空著雙手來到人間，又空著雙手離開人間，正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我離開人間的時候，不過多帶走了一條短褲。』。人生的光陰原本就是短促的，如果我們不能一天一天的，一月一月的，一年一年的來充實自己，來盡自己的心力，多做些有利於國、有益於大眾的大事小事，那麼生命就如一片雲霧，亦如一陣去而不返的飄風。只要大家能夠這樣體察憬悟，那就不會再發生私心和貪慾，亦就不會再有煩惱的紛爭，人人都過著心安理得，力爭上游的生活，社會上自然會充滿了和諧進步，國家亦自然是一片興盛的景象了。」

經國先生在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對青年朋友們講話時，也曾講起了他在上海讀書的一段往事。

他說：「我還記得自己在上海讀書的時候，內心裡最感到恥辱和憤恨的，就是當時許多外國人對我們中國青年的譏諷和嘲笑。他們說：『中國青年只有三分鐘的熱度。』就是說中國人沒有恆心和毅

力。又說我們是『冷血動物』——就是說中國人沒有勇氣和正義感；再說我們是『一盤散沙』——就是說中國人不能夠團結；再說我們是『東亞病夫』——就是說中國人是衰弱的民族。今天想起來，這些都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但是如果我們反省檢討一下，中國青年半世紀以來，究竟改變了多少呢？自然這一代中國青年確實比半世紀以前進步了很多，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也仍然有一部分青年人，依舊沒有勇氣，缺乏毅力，不顧團體，不是一羣雄赳赳氣昂昂、結結實實的現代青年。難道我們就讓這種情形再延續下去嗎？不！我們決不能成為時代的落伍者，而應當成為時代的創造者。我們應當下定最大的決心，從自身開始作脫胎換骨的改變。每個人都要練成堅強的體魄，養成寬容的氣度，從大處想，向遠處看，向下紮根，向上結果！」

從這裡可以看出經國先生在青少年時，就報國有心，救國有志，是一位「學問為濟世之本」的實行者，而且他的學問，不止是書本上的理論，兼之了解「生命即教育」，我們國人常說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有儒家「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胸懷。「秘傳一字神仙訣，說與君知只是『仁』」。照顧別人，愛護別人，捨己為羣，充實服務的人生觀。

經國先生在進入浦東中學幾個月之後，他的父親送他到北平。那時上海正在反日如荼般的混戰中。在北平，經國先生就讀於吳稚暉創立的「海外補習學校」；吳氏號敬恆，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和社會改革家，其後他並成為蔣公的一位頗受尊敬的顧問和經國先生的導師。在導師督導下的經國先生，在北平就讀了幾個月，然後在民國十四年七月，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要到莫斯科求學，這年十月，登

蔣經國的一生

上一艘貨輪，啓程前往蘇俄。

二、在蘇俄的日子

經國先生從民國十四年留俄，真是留得太久，顛沛流離，一場惡夢，到二十六年回國，足足有十二年的日子。這一串長長的日子，真實情況如何，有人寫得語焉不詳，更有中共的從中歪曲，於是人言言殊，只有經國先生自己寫的回憶錄，最爲真實，最爲詳盡，這是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克萊恩博士及其夫人於民國五十二年受經國先生之託，囑於他死後發表的。爲什麼要如此神祕，一定需在他死後發表，因爲牽涉到「寫給母親的一封信」，是鬥爭他的父親，其實這封信是中共陳紹禹（王明）偽造的，作者曾謂「蒙騙半個世紀，今始大白天下」，發表於「傳記文學」七十八年四月號第五十四卷第四期（見本書附錄二）。經國先生在這回憶錄之前，曾寫下如此的警句：「爲什麼你不能忍受這小小的困苦？誰說黑暗之後沒有光明呢？誰說冬雪、霜、冰雹、冰不會融化呢？誰說今天的暴風雨會愈加嚴重呢？誰說你的失意會引你走向絕望呢？你難道不知道，夜去了便是天明？你難道不知道嚴冬之後是暖春嗎？」茲將其唯一的回憶錄，摘要轉述如下：

一九二五年

每次都當選示威領隊

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民衆仇外情緒高昂，全國各地到處可聽到諸如「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當時我在上海浦東中學就讀，參加了四次示威活動，每次都當選浦東中學示威隊伍的領隊，也當選抵制洋貨小組的領隊。

那年暑假，我前往廣東探訪父親。廣東當時是國民革命基地，因此，「奔向廣東」成爲爭取高瞻遠矚之士挺身對抗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的嘹亮口號。抵達廣東後，那種獨特的革命精神使我深受感動。這是我頭一次看到「聯俄」「聯共」「工農聯合」等標語張貼在黃埔軍校校園內。在那裡我遇到許多俄國人。有人告訴我，俄國人是中國人的唯一朋友，蘇聯的統治者既非皇帝亦非上帝，而是工農當家。

在這種情況下，我渴望參加國民革命軍。從孩提起，這就是我的目標，但抵達廣東後，這種慾望更強烈。

不過，父親這時不讓我立刻實現願望，反送我到北平求學。我在北平只待了幾個月，因為我在那裡經由邵力子介紹，結識了中國共產黨員李大釗。李大釗住在蘇聯大使館，透過他的引介，我認識了很多俄國人。許多朋友建議我到蘇聯留學。此議深合我心，因為我也想熟習蘇聯的政治組織，所以我決定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為準備赴俄，我先到上海以便搭船成行。就在離滬前，我正式參加中國國民黨，以十六之齡成為這個革命組織的一員。

一九二五年十月，我告別上海啓程前往莫斯科，此行搭的是一艘貨輪，艙位原先是用來運牲口的，騷味極重，令人反胃，我幾欲暈厥。貨輪停泊在黃浦江約五、六小時，我打算上岸回家。但看到許多同伴留在艙位上，我不禁自問：「他們能忍受，我為什麼不能？」我想，身為黃埔軍校校長之子，如果我中途開溜，一定會引來嚴厲批評。為此，我強制自己留在船上。

貨輪出海後第一天，船上大約九十位學生分成幾個小組，一起開會、交談、學習、飲食。儘管這是我首次接觸團體生活，我却發現這種生活優點很多，非常喜歡。當同學之間進行熱烈討論時，我甚至忘了艙房裡的臭味。在船上，我看了許多書，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亦在其中。我還研究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這是我所看的第一部共產主義思想書籍。

我們在海參崴上陸後，改搭普通列車轉往莫斯科。

我終於到達莫斯科

在搭乘火車長行，整整廿五天當中，我並不感覺孤單，而在越過西伯利亞莽莽荒原之際，我幾乎完全忘掉了氣候酷寒。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的一個傍晚，我終於抵達莫斯科。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一抵達莫斯科，我就進了中山大學。有些與我一道來的中國學生是國民黨黨員；另外有些人與共產黨有牽連，卻也加入了國民黨。還有人不屬於任何黨派。

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有個支部，它的組織與訓練方法均安排得極為妥善。它的黨員組織嚴密，並受到嚴格監督，永遠遵照中央集權領導的指示行動。他們生活簡樸，紀律嚴明。因此，有一陣子，我覺得對他們的活動比較有興趣。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就是我到俄國幾個星期之後，我加入了所謂的共青團。

嗣後，我苦修俄文。我也對與西方革命有關的科目與政治學及經濟學，花了許多功夫。我在

學生刊物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兩篇是「中國的展望」與「中國北伐一定成功」。我覺得這些文章都寫得不錯，擲地有聲。

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有人邀我到群眾大會，就「中國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後的成功」這個題目，用俄文對三千人發表演說。這是我首次對公眾演說，不過卻使俄國人民大為激賞。一個星期之後，我在鐵路工人大會上，就「偉大的孫中山先生」這個題目，對大約三千五百人演說。以後，我時常被請去演說，每次都受到聽眾熱烈的歡迎。

中山大學校長芮德克，是教我中國史的老師。他對於中國的種種問題極為熱中，時常在下課後與我私下討論。他是托洛斯基所創學派的領導人物之一，因此時常向我詳說托氏是位偉大領袖。他常對我說：「要做一位年輕的革命志士，首先你得勇敢。其次，你必須苦幹，積極進取。就像上樓一樣，如果你辦得到，就一次跨兩三步。不要設法一步一步走，那樣子就表現不出革命志士應當有的朝氣。第三，你永遠都不得屈服或退卻。托洛斯基是位勇武的革命志士典範。」

碰巧我的觀點與托洛斯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於是許多人認為我是托洛斯基的同情者。事實上，他們的臆測是正確的。我開始與幾位中國同學研讀托洛斯基學派的祕密著作，對於托洛斯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尤感興趣。後來我越來越熱中托洛斯基學說，終至加入祕密學社。跟隨我的同學日多，並開始視我為托派的領導者。

這時候，相信托洛斯基理論的同學都不敢讓別人曉得他們的觀點，我遂在校刊上發表「我從

未如此說過」一文以糾正他們的緘默。我竭力鼓吹同學間的暗中活動，並勸他們以小冊子和開會表示反對史達林的態度。

蘇聯當局和蘇共早已以嚴厲手段箝制托派。我的一些同學已經被捕。校方爲平息學潮邀請史達林來校演講「托派的錯誤」，這是我首次看見史達林。然而我不爲所動，堅持我的政治觀並繼續反抗史達林政權的活動。

當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認爲我回中國比留在莫斯科對他們威脅更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從孫中山大學畢業，同一群畢業同學要求回中國，卻未得他們允許。中共說：「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爲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他留在蘇聯。」

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

返鄉不得 加入紅軍

我現在被完全孤立於中國之外。從前雖然可在經過檢查後和親友通信，現在已被禁止。我無法不懷念雙親和祖國，看起來，回國探視家人的機會非常渺茫。

我熱切希望回國。既然屢請不准，我在失望之餘申請加入蘇聯紅軍。獲准後被派駐莫斯科的第一師，首度過起軍人生涯。

該所學校規定須研習三學年的課程。

在畢業之前，我每年均得參加長達兩個月的大規模野戰演習，以完成團戰術及野戰軍團作戰計畫方面的訓練。我在戰術、游擊戰，以及武裝顛覆方面——其中包括發動顛覆攻擊及反顛覆攻擊，花了極大功夫，仔細深研；我還寫了一篇主題為「游擊戰戰術」的論文，測試自己的學養。

除了軍事課程外，我還研習政治、經濟、哲學，尤其是唯物辯證法。

然而，我的政治活動卻一直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嚴密監視。一九二八年早期，我的部分同學勸我寫份聲明，退出托洛斯基組織。由於我當時並不瞭解托洛斯基理論，我接受這項勸言，與該組織的祕密活動斷絕關係。

我採取上述行動後不久，中共派駐莫斯科的代表團即指控我在蘇聯組織了一個稱為「江浙同鄉會」的反革命團體。中共指稱，該團體是在家父指示下組成的，並由他資助。

中共發現我寫給家父的兩封信後，尤感振奮。事實上，從六月至一九二八年八月的這段時間，我每隔一、兩天就會寫信給家父，但這些信我自己讀了二至三遍後，就全都毀了。上述兩封信當時還在我手中，但卻被我的一位同班同學取走，交給共產國際（我想現在還在他們的祕密檔案中）。這兩封信內容所述，僅是我的思鄉之情，以及對過去荒唐的自責。然而，儘管這些僅是談及私事

的信函，卻仍被中共當作要求蘇聯政府逮捕的藉口。

蘇聯政府並不願這樣作，因為蘇聯當局很快即發現，所謂「江浙同鄉會」完全是中共捏造出來，用以攻擊我的虛假名稱。中共騙局遭揭穿後，中共對我及與我有關的人的怨恨之情，即變成十分激烈。

一九三〇年我從該所學校畢業，並再度要求返回中國。我同時表示，如果不能奉准返國，希望能分發到蘇聯部隊，這是我第二個選擇。我相信，如果不是中共干涉的話，蘇聯政府會考慮同意我的第二個選擇。我淪為中共代表團宰割後，前述兩項心願均未能達成。

最後，我終於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被指派在前稱為中山大學的列寧大學中，擔任中國學生訪問團的助理團長。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

受僱工廠擔任學徒

我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受僱於塔那馬電機工廠(Tinama Electrical Plant)，擔任學徒。從學校到

工廠並不是一段容易的轉換歷程。一開始，我很難勝任我的工作，因為我從未作過如此繁重的勞力工作，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一天整整工作八小時，中間僅有一小時午飯休息時間。兩天後，我的雙手腫脹，背部酸痛。在痛苦與虛弱纏身之際，我堅信艱苦的工作適足以自我磨練。

我必須設法改善命運，所以我決定到一家夜校去補習工程學，同時，我抓住一個機會在工廠裡教軍事學，我覺得前者可以改善我的地位，後者在目前可以增加我的收入。

我進夜校以後，增加的知識使我在工廠裡的技術改善了許多，五個月後，我每個月的工資增加到一百零五盧布。

我在工廠裡努力工作，建立了很好的名譽，所以在一年內，管理部門建議調升我為主管生產管制委員會的副主任。

然而，我一直沒有奉准擔任這個職位，因為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紹禹反對這種建議，因此，我繼續在工廠裡做勞工。

除了我個人的失望以外，列寧大學（我住在列寧大學宿舍裡）也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波，我在一次會議中公開抨擊陳紹禹。結果，共產國際的幹部要我離開莫斯科到西伯利亞阿爾泰的採礦工廠去做工，我由於健康關係向俄國共產黨總部申訴，請求不要把我送到北方。俄國共產黨批准我的請求的時候，我很高興，因為我可以在莫斯科繼續求學。但是陳紹禹卻不考慮我的任何願望，表示反對，我奉令離開莫斯科。

不過，俄國共產黨沒有把我送到阿爾泰，只叫我搬進莫斯科區的謝可夫村，在這裡，我發現我可以認識俄國社會較多的部分。那是一九三一年秋季。當時俄國政府剛宣布要推行集體農場政策，以便提高生活標準，我在村裡沒有擔任任何特別任務，只擔任一個勞工。

睡在教堂的庫房裡

謝可夫村實際上是莫斯科區最落後的鄉村，農民教育水準很低，態度也很惡劣。我到達的第一天，他們把我當做一個外國人，我連一張睡覺的牀都找不到，那一天晚上，我睡在一所教堂的庫房裡。

第二天，我起床後就走到田裡。農民們嘲弄我說：「瞧，這裡來了一個人，他只知道享受麵包，不知道怎樣犁田！」

他們給我一匹馬和一些種田工具，我原以為犁田是很難做的工作，但是後來我發現並沒有我預料的那樣困難。

那一天，我沒有勻出時間去吃飯，事實上，在太陽下山以前，我一直沒有停止工作，我回到庫房的時候，真是很累，我覺得渾身疼痛，吃一點食物後，我就上牀睡了。

不到四小時便破曉了，儘管身子疼得更厲害，我照樣起床下田。